

## 保坝与建闸：民国胥河水利冲突背后的舆论引导与利益诉求

蒋 静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民国以来,胥河水利冲突日益激烈,开坝建闸的呼声屡次响起,却又次次偃旗息鼓。长期以来的灾害风险认知体系下,坝成为被“鼓吹”的对象,掌握着话语权的政府和社会精英们利用自上而下的舆论引导,使“建闸”的呼声归于沉寂。政府和社会精英们不仅是灾害风险认知体系的主要建构者,也是社会舆论的主要引导者,以其为主导性力量的高淳坝东与下游溧宜锡吴地区因共同的湖田利益诉求,坚持保坝,而高淳坝西与皖南地区则因松散的水利组织关系和省界、湖滩等纠纷未坚持开坝,以致底层农民成为这场水利冲突背后真正的利益受损者。改坝建闸的失败生动地展现了民国时期统治阶层往往通过舆论控制来应对水利冲突,从中折射出社会各类群体间复杂的利益关系。

【关键词】胥河;东坝;水闸;舆论;利益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6-0062-11

## Dam Preservation and Gate Construction: The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the Demand for Interests behind the Conflict over the Water Conservancy of Xu River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NG Jing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flict over the water conservancy of Xu River became increasingly intense, the call for opening dam and constructing gate had been raised repeatedly, but had been subsided repeatedly. Under a long-standing system of disaster risk perception, the dam became the object of advocacy, and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elites who control the discourse used the top-down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to silence the call for constructing gate.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elites were not only the main constructors of the disaster risk perception system, but also the primary leaders of public opinion, which was a leading force to a common demand of lake-farmland interests,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elites in the east areas of Gaochun Dongba and the downstream areas of Li-Yi and Xi-Wu upheld to protect the dam. However, the west areas of Gaochun Dongba and the south areas of Anhui gave up opening the dam in order to loose water conservancy 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s and disputes over provincial boundary and lake shoal, causing the grassroots farmers to become the real sufferers of interests behind this water conservancy conflict. The failure to transform the dam into a gate vividly demonstrates the response mechanism to water conservancy conflicts under the control of public opinion by the ruling clas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reflecte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of interests by various powers from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local society.

[收稿日期] 2023-04-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运河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7ZDA184)

[作者简介] 蒋静(1994-),女,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Key words:** Xu River; Dongba; sluice gate; public opinion; interest

胥河作为沟通长江与太湖的重要河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自胥河开凿,胥河之上的水利工事时建时废,直至明初东坝建筑,自此西水不复东流,但其后几百年间东坝存废之争不绝于耳。民国以来,学界关于胥河东坝的地理科学研究日益增多。1917年丁文江调查胥河东坝一带的地质,得出结论,高淳至溧阳的水道即胥河,为人工开凿而成,不可能是“三江”中的中江<sup>①</sup>。这是高淳东坝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主开展的较为科学的地质调查。1928年胡品元、萧开瀛调查高淳、溧阳水道及东坝情形<sup>②</sup>。1933年胡焕庸与任美镠、李旭旦赴高淳东坝对东坝的历史、现状、地形、水利、交通等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察<sup>③</sup>。而后武同举编纂的《江苏水利全书》,将上述东坝调查在内的许多成果收录其中<sup>④</sup>。50年代以后,学界关于胥河东坝的研究依旧集中于其由来与形成历史。魏嵩山对胥河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sup>⑤</sup>。高山论述了东坝得名由来<sup>⑥</sup>。汪家伦、孙仲明详讨了关于胥河历史、变迁及利用的相关问题<sup>⑦</sup>。

21世纪以来,随着生态环境史和区域社会史的发展,学界越来越多地将胥河与东坝置于区域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展开研究,沈知天将高淳东坝置于江南地区内部不同区域存在着多重不平衡性的历史背景之下,认为东坝的长期存在是江南地域间不平衡性与政府治水方略的局限性综合作用的结果<sup>⑧</sup>。程宇铮从水利学角度出发,认为关于胥溪的护坝论、废坝论之争,不仅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与区域矛盾的重要反映,更丰富和发展了明清时期的太湖水利学理论<sup>⑨</sup>。该文虽提及清朝时期的改坝为闸论,但未有深入讨论,并简单地认为改坝为闸论仅是废坝论与护坝论折中的结果。胡吉伟的研究认为民国以来政府为保下游田赋,在太湖流域水利治理中偏向下游的政策导向,使其始终坚守固坝政策,对东坝上游水患视而不见,因而不予治理<sup>⑩</sup>。

综上,学界有关胥河东坝的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也存在两点不足。第一,缺乏对民国时期胥河东坝改闸问题的研究。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胥河的历史及其形成过程,以及明清东坝建筑始末。然而,民国以来随着实地查勘东坝等科学活动的展开,多次爆发“改坝建闸”的呼声,但学界对此缺乏关注。第二,缺乏对东坝高筑后太湖上游及西太湖一带的湖田研究。湖田研究一直是太湖流域生态水利与社会经济研究的重点,但多集中于太湖下游及东太湖地区。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民国胥河改坝建闸问题的研究,探讨改坝建闸一案为何屡屡失败,是谁在背后操纵这一切,何以坚决反对改坝建闸,隐藏在其后的社会根源究竟是什么?

## 一、被“鼓吹”的坝:灾害风险认知体系的建构

胥河源出固城湖,经固城镇、东坝、下坝、邓埠至溧阳社渚镇朱家桥桡溪河口,上接水阳江,下连荆

① 丁文江著,汪胡桢译:《调查:扬子江下游之地质(续)》,《太湖流域水利季刊》1928年第1卷第3期。

② 胡品元、萧开瀛:《调查:高淳溧阳水道及东坝调查报告书》,《太湖流域水利季刊》1928年第2卷第1期。

③ 胡焕庸、任美镠、李旭旦:《东坝考察记》,《方志月刊》1933年第6卷第12期。

④ 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南京水利实验处印行,1950年。

⑤ 魏嵩山:《胥溪运河形成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S1期。

⑥ 高山:《东坝正名》,《历史地理》1983年第3期。

⑦ 汪家伦、孙仲明:《关于胥溪运河的若干问题》,《太湖水利史论文集》,1986年。

⑧ 沈知天:《高淳东坝的兴废及其影响研究——以江南地区内部地域间不平衡性为背景的考察》,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⑨ 程宇铮:《胥溪五堰兴废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研究(1368-1912)》,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⑩ 胡吉伟:《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系治理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溪,沟通了长江与太湖。胥河地势西高东低,每逢汛期或洪水期,胥河水位差极大,水流湍急,不利航运,故为便利航运起见,唐景福元年(892),杨行密为运送军粮而修建鲁阳五堰,以改善胥河水流湍急的情况。五堰之设置,虽起到了改善水位差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南唐末年,商贩便因运输木排过坝较为困难,哄骗政府废弃五堰。北宋时期,单鶚建议疏浚胥河,五堰得以恢复。至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为抬高固城湖水位,以保证石臼湖水流向秦淮河,方便漕粮直抵金陵,再次疏通胥河,建石闸,通过启闭石闸来调节水位,此举既有利于航运,又免去了货船盘坝之苦。明永乐元年(1403),迁都北京后,京杭大运河江南段重新开通,胥河航运地位不再重要,于是改闸为坝,是为东坝建筑之缘起。明正德七年(1512),为防下游水患,东坝增筑三丈。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沿坝居民为盘驳之利,自坝东十里许更筑一坝,名曰下坝,借以蓄水,以便转运。两坝之隔,将胥河分为三段,东坝以西之河名上河,下坝以东之河名下河,两坝之间名中河。之后数百年间,胥河上始终维持着以东坝、下坝两坝相阻的基本格局,直至1958年人民政府为抗旱计,拆除东坝坝头,东坝自此消失于胥河之上。

民国以来,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人们对水文认知有所提高,水利技术也有所发展。越来越多的地理学家、水利学家开始对胥河及东坝进行实地考察,针对上游水涝下游淤塞之症提出可建设新式水闸的提议。胡品元、萧开瀛建议:“建造活动闸堰,司蓄泄之调节,规画确当,旱潦均除。”<sup>①</sup>胡焕庸等提出:“浚深中河,并在上下两坝,各设水闸,以时启闭,则长江太湖,水运既可直达,而苏常一带亦无陷溺之虞。”<sup>②</sup>武同举认为可在“上下两坝外之坚地,各建新式水门,酌于上河旁开倒勾引河,使其回屈经由新水门以入中河,更于中河尾辟倒勾引河,亦使其回屈经由新水门以入下河,又邓埠附近下河中,亦建新式水门,以为关锁,有两道弯曲,则水势少汗,有三重节制,则水溜稍平”<sup>③</sup>。上述地理学家、水利学家之建议基本遵循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设想“浚广浚深芜湖、宜兴间之水路,以联长江与太湖”<sup>④</sup>。这样既可以通过启闭水闸来调节水位以利通航,也可以防止增加上下游旱涝威胁。简言之,将胥河上之水利工事改坝建闸,可使胥河同时兼具航运、防洪、灌溉三大功能。既有此一举三得之建议,为何迟迟未得以实施?

要想探知东坝之所以能够存续几百年而未改闸成功的原因,需要从胥河的下游,即太湖流域民众的思想认识入手。因为“太湖流域之人民,大都有一传统之思想,即东坝开放,则太湖流域将陆沉”<sup>⑤</sup>。这一思想认识是长期以来灌输的结果。东坝是由闸改坝而来,在明迁都以前,出于经济因素考虑,胥河水利往往重航运而轻防洪,但自明都北迁后,胥河航道废弃,太湖水患不断加重,随着航运地位的下降和防洪需求的提升,人们迫切地希望改闸为坝,加固加高东坝,以抵御上游倾泻而下的洪水。于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人们对于洪水灾害风险的认知逐渐加深,即就是要加固加高东坝,而这种灾害风险认知又并不完全是自然生成的,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处社会构建的。西方社会建构主义框架下认为:“这些社会关系背后所隐藏的利益位置和影响机制,它们主导了社会内部的灾害风险界定……任何灾害风险的界定、认知和集体建构一定是在地的(local)形式,即根据地方特殊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脉络发展出来。”<sup>⑥</sup>所以人们对环境灾害风险的认知与长时期的接受是在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整个社会基于政治经济、历史经验和民间观念等,建构出一套固坝守坝方针,即便时有改闸之声,亦难撼动东坝地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央政府在制定太湖流域水利治理事务的政策时,始终偏向下游的太湖地区,这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与城市水利相比,乡村水利、东坝上游水利因薄弱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而受到忽

① 胡品元、萧开瀛:《调查:高淳溧阳水道及东坝调查报告书》,《太湖流域水利季刊》1928年第2卷第1期。

② 胡焕庸、任美镠、李旭旦:《东坝考察记》,《方志月刊》1933年第6卷第12期。

③ 武同举:《东坝考》,《江苏研究》1935年第1卷第3期。

④ 孙中山著,林家有整理:《建国方略》,中华书局,2011年,第139页。

⑤ 萧开瀛:《东坝以上之水利问题》,《水利》1947年第14卷第5期。

⑥ 周利敏:《西方灾害社会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视。”<sup>①</sup>因此，民国政府以更广大区域内的长期利益为原则，始终奉行传统治水政策，为维护下游的经济安全，坚持保坝政策，从国家层面奠定了保坝政策的合法性地位。还有，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大水，“高淳金堡圩民盗掘东坝，苏松常镇诸府遂成巨浸”<sup>②</sup>。与此同时，“高淳境内，水面陡涨三尺”<sup>③</sup>。此次开坝泄水，不仅无补于上游，反使下游尽成泽国，因而此次掘坝事件被视为殷鉴不远。当民国开坝建闸的呼声渐渐高涨时，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精英皆引以为戒，三令五申，强调开坝有害于下游而无益于高淳。此次灾难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不明真相之民众的恐慌与焦虑，为防止灾难重现，上游民众只能盲目跟从政府的保坝政策。再说，太湖流域民间充斥着“东坝开不得”的民谚歌谣，如“倒去东坝闸，淹没吴江塔”；“宜兴溧阳，终究不长。东坝一倒，性命不保”；“高淳东坝倒，北寺塔上漂稻草”。这些民谚民谣反映了上游高淳与下游吴江地势的高度差极大，认为东坝河底与苏州谯楼顶相平，所以只要东坝一开，则吴江必遭淹没。

在灾害风险认知体系的影响之下，“坝”之功用被极力鼓吹，这在20世纪30年代三次旗帜鲜明的“改坝建闸”呼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三次改坝建闸的目的各不相同，发起者也有所不同，1931年是为减轻上游水患，发起者为东坝上游高淳与皖南人士；1934年是为救济下游旱荒，发起者为东坝下游溧阳武常人士；1937年是为便利军事运输，发起者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但最终均因东坝下游各县民众以“东坝为太湖流域之命门，一旦开放，江南各省，陆沉可待”<sup>④</sup>为由坚决反对而失败。

然这套由政府和社会精英有意识地引导民众构建的灾害风险认知体系就是真实可靠的吗？东坝存在的数百年间真的大大减少了下游灾害吗？建闸方案是因不能解决这悬殊巨大的水位差问题才遭置之不理的吗？

本文对东坝建筑前后的高淳、溧阳水旱灾害分布进行统计（图1），以明正德七年（1512）东坝增筑三丈为分界点，分两部分时间段进行对比，上至唐景福元年（892）杨行密修建鲁阳五堰，下至1937年。因年代久远资料不全，尤其年代愈远资料愈不全，虽不能准确反映历史上的水旱灾害，但据现有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亦能说明一定问题，特别是反映长时段的水旱灾害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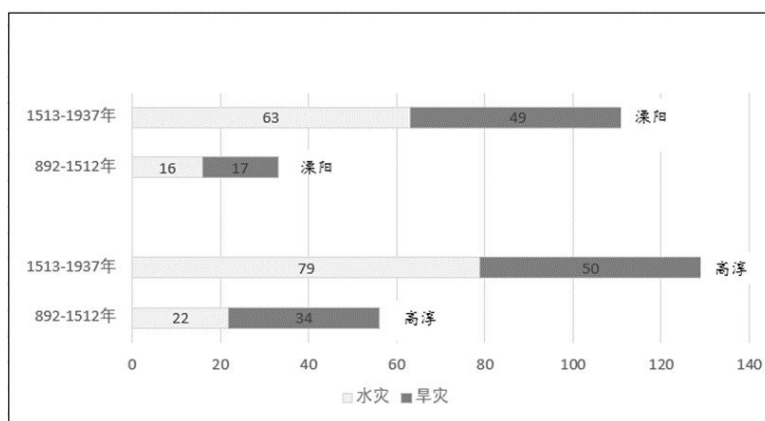


图1 东坝筑高前后高淳、溧阳地区水旱灾害分布对比

资料来源：高淳县水利志编纂委员会：《高淳县水利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3-67、72-75页；高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淳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6-130、133-136页；溧阳市水利农机局编：《溧阳县水利志》，1995年，第60-66页；溧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溧阳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7-150页。

① 胡吉伟：《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系治理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69页。

② 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三十七《胥溪东坝考》，南京水利实验处印行，1950年，第19页。

③ 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三十七《胥溪东坝考》，第32页。

④ 《江苏各县纷电制止开放东坝》，《申报》1931年9月12日第14版。

自东坝加筑完成后,其后四百余年相较其前六百余年,东坝上游水灾次数显著增加,东坝下游干旱次数明显增加。上游高淳水灾由22次增长到79次,下游溧阳旱灾由17次增长到49次。且高淳与溧阳的旱灾次数在东坝加筑后几近持平,盖因高淳地势西低东高,东部丘陵山地本就高阜,东坝增高后,横贯其间的胥河受阻,使得坝东高淳地区与溧阳旱灾几乎同步。溧阳地区的水灾相较高淳少些许,但却是以牺牲高淳为代价换来的,且总体上看水患依旧频发,东坝以“防下游水患”为目的的建造意图似乎并不凸显,反而大大增加了下游的旱灾风险。

至于改坝建闸方案究竟能否解决胥河悬殊的水位差问题,根据1937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对东坝改建船闸后对太湖水位之影响的测算,“今如假定每日放船两次,每次需水约六千立方公尺,每日共放水12000立方公尺。积一月计亦不过360000立方公尺,以太湖面积之大(2200平方公里),即不将下游各干支流之泄水量容量等计算在内,抬高太湖水位尚不及一公厘也。”<sup>①</sup>此结果表明改坝建闸对太湖流域之水位影响极微,证明了改坝建闸是为解决上下游水利冲突之良方。民国以来,改坝建闸方案长期被民国政府忽视与搁置,这是官方层面第一次公开承认改坝建闸方案具有可行性。

纵观民国以来历次“改坝建闸”呼声,均以失败告终,但期间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政府也未以武装镇压的方式解决“坝”“闸”争议,而是采取了一个较为温和的手段——舆论引导——自上而下引导民众放弃建闸。

## 二、被“消声”的闸:自上而下的舆论引导

自上而下的舆论引导是指由统治阶层发出并在人民大众间传播的一种公众意见。而在这波由统治阶层掌控和引导舆论走向的力量中,其成分也颇为复杂。他们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力量,以社会精英为辅助力量,社会精英又分为不自觉地沦为当局辩护者的知识精英和自觉成为政府口舌的地方士绅。那么政府当局究竟是如何以舆论引导民众,地方士绅又是如何影响民众,知识精英又是如何在其中沦为了当局的辩护者?

民国以来虽然“改坝建闸”的建议越来越成为知识精英的共识,但知识精英们对开闸一事并非强烈推崇的。地理学家、水利学家们虽承认建闸确为上策,但同时也在强调胥河地势水位差极大,拆坝之举不可贸然施行。如胡品元、萧开瀛即从近年来“上下两河水位之相差,动以三五公尺计,决坝之说,固未可贸然出之也”<sup>②</sup>。武同举认为“东坝问题之症结,不在古今水道之通塞,而在东坝附近之地势,上下河水位高低之比较”<sup>③</sup>。且受近代地理测绘水平的限制,对于改建水闸的具体地点与具体形式顾虑颇多。傅汝霖还提出“筑闸之后,管理须如何严密,大水之时如何可以不被人偷启,事前均须有深切之研究”<sup>④</sup>。上述知识精英们的考量与顾虑固然有理,但也为政府长期拖延和搁置东坝问题提供了借口,有为当局不作为政策辩护之嫌,助长了政府对胥河水利问题长期漠视的风气。

地方士绅阶层作为在地方上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群体,关于东坝建闸与否向来意见不一,虽有部分地方士绅如周伯英、吴俊言、钱廷梁等人支持改建水闸,旱则启之,潦则闭之,以调节水利<sup>⑤</sup>。但其中的反对之声更大,这些反对开坝之声多集中于下游溧宜锡吴人士,无锡县商会常务委员陈湛如认为东坝本就是从闸改坝而来,闸力薄弱,不足以抵挡洪水,今若改闸,岂非重蹈覆辙,更是举证“江北各县之滨临运河

① 《(江苏省)高淳东坝改建船闸工程》,1937年,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号:26-00-11-003-10。

② 胡品元、萧开瀛:《调查:高淳溧阳水道及东坝调查报告书》,《太湖流域水利季刊》1928年第2卷第1期。

③ 武同举:《东坝考》,《江苏研究》1935年第1卷第3期。

④ 《(江苏省)高淳东坝改建船闸工程》,1937年,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号:26-00-11-003-10。

⑤ 《宜兴同乡提议东坝设闸》,《民报》1934年7月11日第5版;《钱廷梁上建厅书东坝又一主张》,《锡报》1934年7月16日第3版。

者，每多设闸，江水发时，水闸往往失其效用，斯为隐患”<sup>①</sup>。宜兴县商会主席郁驯鹿、教育局长杨逸群、公款公产管理处吕冕霖、区长储育民、记者公会干事路丹光等皆谓开放东坝，“足以遗害将来，引为大患云”<sup>②</sup>。宜兴士绅沙彦楷亦认为“毁坝设闸，非特工程浩大，且设闸后，如遇大水，上游人民请开闸，将何以应之，即下游多县，持不肯开，如上游就近之民，用死力强开，或深夜私自毁闸，年年械斗……”<sup>③</sup>这些地方士绅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一边以史为鉴，一边居安思危，无形中增加了民众心中的隐忧与顾虑，为当局的不开坝政策提供助攻。

知识精英和地方士绅的潜在风险意识经过灌输奠定了胥河之上不可贸然开坝的舆论基础。当局充分利用社会精英们的舆论影响力，一旦“开坝建闸”呼声响起，即自上而下引导舆论，通过“夸大后果、制造舆论——另谋他法、安抚舆论——利用报刊、控制舆论”三步方略，使“建闸”呼声一次次归于沉寂。

首先，积极派出相关人员实地勘测胥河上中下河水位情形，并长期以水位差为借口，夸大后果，制造舆论。兹将苏建厅于1931年9月、1934年7月、1937年9月察勘胥河东坝所测数据，与1917年9月丁文江，1928年9月胡品元及1933年11月中央大学地理系所测上中下河水位情形进行比较（表1）。

	下河水面低于下坝顶之距离	中河水面低于下坝顶之距离	中河水面低于上坝顶之距离	上河水面低于上坝顶之距离	上河中河水位相差之距离	中河下河水位相差之距离	上河下河水位相差之距离
1917年	7.00	2.50	2.50	2.50	0	4.50	4.50
1928年	5.17	1.45	2.52	3.02	0.50	3.72	3.22
1931年	——	——	3.50	0	3.50	6.50	10.00
1933年	4.50	0.70	1.40	2.40	1.00	3.80	2.80
1934年	7.00	1.85	2.50	2.22	0.28	5.15	5.43
1937年	——	——	——	——	1.00	4.00	5.00

资料来源：胡焕庸、任美镠、李旭旦：《东坝考察记》，《方志月刊》1933年第6卷第12期；武同举：《东坝考》，《江苏研究》1935年第1卷第3期；《建设工程师林保元等察勘东坝水位之报告》，《江苏月报》1934年第2卷第4期；《（江苏省）高淳东坝改建船闸工程》，1937年，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号：26-00-11-003-10。

察上表所列各年份胥河水位情况，1931年上河水位几乎与上坝坝顶齐平，是为大水之年，较诸其他年份上河水位确为最高。1934年之上河水位低于上坝坝顶2.22米，与其他年份相差不大，甚至反高于1917年、1928年、1933年三个年份些许。中河东西两端有两坝相隔，相当于一个天然的“蓄水库”，其水位变化受季节、雨量、灌溉用水及刘公桥堰泄水等诸多因素影响，较为复杂，而上河中河水位差除1931年大水之年外，其余年份相差不大，甚至时常出现中河水位高于上河水位的形态。上下河水位差在1931年达到10米之巨，其余年份则多在三五米之间，可见一般年份上下河水位差尚算稳定。

综上所述，1931年，东坝上河水位已与上坝坝顶齐平，上下河水位差达10米，水位落差越大，流速越快，东坝一开，短时间内上游洪水必当势如破竹，汹涌而来，此年“东坝水位落差极大，东坝不可开”的查勘结果尚属客观，此时确非开坝时机。1934年中河、下河水位虽与常年相比确有所降低，但上河水位尚略高于常年。该年苏建厅东坝查勘报告中有言“东坝附上河水位，较去年约低三米，存水平均深度，约仅三公尺，较民国二十年，尚低约六公尺。”<sup>④</sup>该年实测上河水位低于上坝坝顶仅2.22米，除非去年上河水位越过上坝坝顶0.78米，否则该年如何较上一年还低三米呢？而1931年东坝上河水位与坝顶相平，上河

①《武进县防荒会昨议决开放东坝引水救旱》，《锡报》1934年7月11日第2版。

②《一旦实现关系东南各县匪小》，《人报（无锡）》1934年7月12日第2版。

③《东坝决不开放省方采纳本县意见》，《锡报》1934年7月13日第3版。

④《建设工程师林保元等察勘东坝水位之报告》，《江苏月报》1934年第2卷第4期。



水面与上坝坝顶之距离应为0米,那么该年水位如何能较1931年还低六米呢?可见此处查勘所言与事实不符。因而该年“建厅派员察勘东坝水位极低”<sup>①</sup>一说实属有些言过其实。1937年上下河水位差则在5米左右,政府不断强调改闸后“一旦水流不能节制,太湖流域不免酿成巨灾。”<sup>②</sup>此水位差尚属常年标准,且本年芜湖、溧阳间恰值低水位时,本应是个谋建船闸的良好时机,却又顾虑低水位时期“其间航道之浚深所费恐不在少数”<sup>③</sup>。高水位时期担忧水淹下游,低水位时期担心疏浚花费过巨,互相矛盾不过是政府不欲建闸的托辞。

政府不以开坝建闸解决防洪灌溉以及通航问题,那么必然得另谋办法,以安抚舆论。1931年因大水泛滥要求东坝放闸之说甚炽,政府和地方精英们筹谋其他泄水办法。江苏省政府闻有开放东坝之谣后,“由厅委江辅勤驰往高淳,会同地方官绅勘觅适当水道,另筹施工宣泄该县积水办法,以期双方兼顾”<sup>④</sup>。地方精英谋高淳水之出路有三:一为毁坝复闸;二为开一条经安徽境入江的河,使水道可以向西宣泄;三为另开一条河,经石臼湖、会秦淮河,最后流入长江,使水道可以向北宣泄<sup>⑤</sup>。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也提出:“不必废坝复闸,以的迎矢,而能因地制宜,两利俱存,则建滚水坝是也。”<sup>⑥</sup>但上述方案最后均未实现,中止原因,或以地势西高东低,西来之水难以逆流;或为金陵方面不同意天生桥河复开;或因工程艰难经费短绌等。

1934年因旱荒开坝之声日烈,政府与地方士绅遂决定开放长江三处水闸以救济旱荒。分别“开放黄田港闸,可引江水入锡澄虞三县,开放小河口闸,可引江水入武宜溧锡等县,开放白茆港闸,可引江水入苏虞锡诸县”<sup>⑦</sup>。其中,白茆港闸恰好“上年常熟曾将白茆河开浚,今年锡邑毗邻各区,即多资以灌溉,其为受益可知”<sup>⑧</sup>。武进小河口闸,则因久未疏浚,河口为“木排所阻”<sup>⑨</sup>,水流不畅,流入武进之水量尚且不足,更遑论流入宜兴、溧阳之水量,必须先将壅塞之木排予以疏通。至江阴黄田港闸,“该港外面三河口地方,沙泥淤塞,致江水内流,无从畅泄……须开浚三河口至黄田港之水道,并改建水闸,始能有效,惟工程浩大,经济恐感不敷,如暂时救济,惟有增高水闸,阻止湖水外泄入江,但此亦仅有利于澄,而无利于锡”<sup>⑩</sup>。对无锡而言,全线疏浚工程需耗费大量时间金钱,非短时间能成。然为救急而加添闸板以增高闸内水位,如此虽有部分江水得以泄入但实属有限,故开放黄田港闸对无锡益处不大。是以开放三大通江水闸之策,救旱效果并不理想。

1937年国民军事委员会建议东坝改建船闸后,国民经济委员会便另提出两个方案,即“上下坝铺设斜坡铁轨,以便民船近坝”和“上下坝旁设置起重机及轻便铁轨,用小机车转运”<sup>⑪</sup>以供替代改建船闸方案。并分析三项办法的利弊得失,认为改闸“恐无法节制水流”,起重机仅能“使货物过坝,船舶不能交通”<sup>⑫</sup>,最终决议采用铺设铁轨办法,既能使船舶货物顺利过坝,又与下游水利无碍,但此方案也存在费时费力的问题,过船速度相较船闸逊色不少。

①《建厅派员察勘东坝水位极低》,《国民导报》1934年7月14日第2版。

②《(江苏省)高淳东坝改建船闸工程》,1937年,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号:26-00-11-003-10。

③同上。

④《苏省府飭县防护东坝》,《申报》1931年9月13日第12版。

⑤《东坝实情录》,《时报》1931年11月2日第6版。

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江苏赈务专员办公室编:《苏赈纪要》之《工赈之部》,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江苏赈务专员办公室出版,1932年,第58页。

⑦《苏建厅决开长江三水闸救旱》,《新闻报》1934年7月14日第10版。

⑧《请别筹通江救旱办法》,《国民导报》1934年7月13日第2版。

⑨同上。

⑩《苏建厅决开长江三水闸救旱》,《新闻报》1934年7月14日第10版。

⑪《(江苏省)高淳东坝改建船闸工程》,1937年,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号:26-00-11-003-10。

⑫同上。

报刊作为民国时期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不仅可以反映舆论信息,而且能够引导、控制舆论。每当开坝谣言传来,政府与社会精英们第一时间利用报刊作为辟谣平台,阐明开坝建闸的不合理性,驳斥开坝谣言,坚决反对开坝,以达到控制社会舆论的目的。

民国时期的普通民众多是目不识丁或者仅是略识文字,民国报刊的“书写者”又多是以政府与社会精英为代表的统治阶层。掌握着“书写权”的统治阶层以报刊作为表达其话语权的“阵地”,竭力在报刊上营造出“东坝开不得”的主流社会舆论,甚至不惜欺瞒民众,以致达到社会上下一致反对开坝。譬如1931年和1934年开坝之议日盛时,各报刊多次刊载道光二十九年因大水掘坝带来的后果,所谓“清道光二十九年,江北大水,高淳农民,曾盗掘开放,致苏松常镇诸府,悉成巨浸”<sup>①</sup>;又“灌注高淳境内,水面陡涨三尺”<sup>②</sup>。民众仅知“道光二十九年掘坝以致上游高淳境内水面反增三尺,下游诸府尽成泽国”,却不知晓其背后原因。开坝后高淳境内水面反增的原因乃是中河河道淤塞甚重,“坝口流量甚少,水经流动,牵动江流灌注”<sup>③</sup>。下游诸府遂成巨浸的原因也并非全因开坝所致,下游吴江地处太湖东滨,运河之畔,河流水系众多,加之地势低洼,自古以来水患之灾频发。据统计吴江自后梁开平三年(909)建县以来至1937年,共计水灾年234次,以1512年为界,前六百余年共计出现水灾158次,平均3.8年发生一次,后四百余年共计出现水灾76次,平均5.6年遭遇一次<sup>④</sup>。即便在东坝加筑后,胥河上游来水断绝,下游水患亦不少,其水患绝非仅因胥河上游来水过大,正如时人之有远见者所谓“荷兰之地形,为著名之低处,因防水得当,不闻有陆沉之患。”<sup>⑤</sup>水患之根源不在上下游之地势差,而在水利设施开发是否得当,如若太湖上下游水利系统开发得当,即便胥河开坝,下游也可免遭水患。

### 三、被“遮掩”的利益:各方社会群体潜在利益诉求

难道只因强烈的灾害风险意识,就使得政府和社会精英们长期坚持只具备单一捍水功能的“坝”,而拒绝兼具防洪灌溉航运三大功用的“闸”?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隐藏在背后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这其中又牵扯到哪些复杂的利益关系?

表面上看,开坝建闸的经费筹措困难是一大原因。经费的筹措是水利建设的基础,然民国政府财政拮据,省方直言,东坝一开,“将来再行堵筑需费二三百万,如此巨款何从筹集”<sup>⑥</sup>。1937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针对高淳改建船闸一案时也考虑到“在芜湖、溧阳间于低水位时欲谋通航,对于其间航道之浚深所费恐不在少数”<sup>⑦</sup>。政府以无力承担改坝建闸的巨款为由拒绝开坝,宁愿将有限的经费用于定期修护东坝,“在水利公债或建设公债项下,指拨五万元,存储省银行,为东坝备理基金,由下游各县自动共同筹集预备金二万元”<sup>⑧</sup>,也不愿拨款开通一条胥河泄水通道。狄锡之曾建议“开放东坝之刘公河,吸引上游之水,灌溉农田”,却因“开坝旁之刘公河,亦颇费工程,非五六万元不办,且时间久长”<sup>⑨</sup>而未获批准。邱毓珩又另拟定计划,“在坝中用引水涵洞三处,吸引上游江潮,约费两万元”,本已“议决呈请建厅,准拨保管

①《苏常镇各县注意东坝问题》,《申报》1934年7月12日第9版。

②《建民两厅勘察东坝之报告》,《宜兴民报》1931年10月3日第2版。

③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三十七《胥溪东坝考》,南京水利实验处印行,1950年,第32页。

④吴江县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吴江县水利志》,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2-161页。

⑤《关系江南水利开放东坝之严重问题》,《新无锡》1934年7月12日第2版。

⑥《省方无意开放东坝》,《申报》1934年7月14日第11版。

⑦《(江苏省)高淳东坝改建船闸工程》,1937年,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号:26-00-11-003-10。

⑧《江南各县会商护修东坝办法》,《中央日报》1931年10月3日第7版。

⑨《宜高溧三县代表会商开放东坝》,《中央日报》1935年6月21日第6版。



之东坝公债五万元,以便应用。”<sup>①</sup>后却遭搁置,涵洞终未开凿。开坝旁之刘公河或开东坝引水涵洞,此水既不致下游水患,又能缓解下游旱情,经费又在可负担范围内。为何也未能实现,细思可知,其真正目的乃是不愿上游涓滴之水流入下游。下游究竟为何不愿上游涓滴之水流入?

要想搞清楚这一原因,首先可以从东坝以下主要河流湖荡的水文情况入手。自东坝以下,中河段地势高亢,且河底倾斜度过大,在中河水量不大之时,1928年胡品元、萧开瀛视察东坝情形时,其西侧“高出河底至少在十五公尺以上,河底已辟成稻田”,“所留狭窄河槽,差容两舟并进,为盘驳货物之航道”<sup>②</sup>。至1937年江苏省政府派汪胡楨视察高淳东坝时“查得上下两坝间中河内,靠近上坝约五华里处,尚有一波河道,为人民侵占耕种,此段河身狭窄,宽仅丈许,深仅二三尺。”<sup>③</sup>中河本为滞水之所,水涨则蓄水,然自民国以来长期水退即植田,直到1937年为军运之需才对中河进行疏浚。

下坝以东,下河地势渐平衍,自下河始为太湖西北上游源头,东坝未筑以前,太湖西北之水源本有二,一为水阳江来水,一为苏皖交界山岭之水。但自东坝筑后,苏皖界岭之水成为太湖西北上游之主源,每逢山洪暴发,山水挟带大量泥沙,山土下注,累年积月湖荡河身淤高,湖田渐增。自下坝东行至邓埠,近年以来,“邓埠上下十数里间,居民乘水浅涸时,于河底挖凿深洞,堆土四周,以为鱼池,比比皆是,因之河底愈积愈高,荡中亦多私垦为田,种植五谷。”<sup>④</sup>随后入溧阳县境,水流继续东行,是为荆溪水系,溧阳境内该水“由西而东,上自社渚昇平荡接高淳县建平县境,下达长荡湖至宜兴县境,其间河道失修,无不淤浅。”<sup>⑤</sup>途中经由三荡,“昇平荡,荡底甚淤浅,水涸时滩地尽出,附近居民私垦为田;三塔荡,荡底淤高,水退即出;南渡荡,荡中亦淤浅成田。”<sup>⑥</sup>上述诸荡,本为蓄泄之所,使旱潦有所容济,今湖荡淤积,滩涂遍布,人们大肆垦辟为田,俾得旱时无以蓄水,潦时无以泄水。据统计,清末民初,溧阳全县湖荡面积10万亩,至1949年缩小到40700亩<sup>⑦</sup>。

入宜兴县境后,水流向东南行至西洑,穿宜兴县城流入东洑,出百渎口最后入太湖。东洑、西洑之间,为宜兴县城所阻隔,水流受束,无以畅流以入太湖。宜溧之洑湖、漏湖本为储水之所,然自民国以来泄口、纳口淤塞严重,洑湖“湖中东滩、西滩、马场滩等,淤涨日甚,容量渐减耳”<sup>⑧</sup>。漏湖“湖中涨滩情形,与洑湖颇相类似者也”<sup>⑨</sup>。其旁“都山及马公两荡,两荡均已淤塞放垦”<sup>⑩</sup>。百渎则位于宜兴东南,“湖水挟沙倒灌,填塞渎口,而渎口既无隄岸闸座以抵御,清水力弱,又不足以资洗刷,日积月累,出水愈难,而泥沙愈积也。至沿湖滩地绵延三里余,口外滩高超过渎底”<sup>⑪</sup>。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太湖上游涸湖成田面积甚广,那又为何会出现此种情形呢?

虽自清朝开始,即有太湖流域所有湖荡永禁升科之明文,但历时久远,私垦湖田,势所难免。且自民国以来,在国家财政式微的大背景下,“涸湖成田,增加巨额之生产”<sup>⑫</sup>俨然成为整治太湖流域水利基本目的之一。政府甚至打着“浚垦兼施”的幌子,公然官产放领,纳价升科。如三塔荡“得教育局之允许,在荡

① 《宜高溧三县代表会商开放东坝》,《中央日报》1935年6月21日第6版。

② 胡品元、萧开瀛:《调查:高淳溧阳水道及东坝调查报告书》,《太湖流域水利季刊》1928年第2卷第1期。

③ 《(江苏省)高淳东坝改建船闸工程》,1937年,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号:26-00-11-003-10。

④ 胡品元、萧开瀛:《调查:高淳溧阳水道及东坝调查报告书》,《太湖流域水利季刊》1928年第2卷第1期。

⑤ 秦绶章等辑:《民国江南水利志》卷七《河工》,1922年,第355页。

⑥ 胡品元、萧开瀛:《调查:高淳溧阳水道及东坝调查报告书》,《太湖流域水利季刊》1928年第2卷第1期。

⑦ 溧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溧阳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3页。

⑧ 龚允文:《太湖流域农田水利略》第一编《水来源委》,太湖水利局出版,1925年,第9页。

⑨ 龚允文:《太湖流域农田水利略》第一编《水来源委》,第10页。

⑩ 宜兴县旱灾救济委员会:《宜兴县旱灾专刊》,宜兴县旱灾救济委员会刊发,1934年,第10页。

⑪ 龚允文:《太湖流域农田水利略》第一编《水来源委》,第8页。

⑫ 孙秉忱:《太湖流域农田水利概况及其整治方策之商榷》,《太湖流域水利季刊》1930年第3卷第2期。

中种植稻禾，倘未淹没而获收获，则向教育局完纳租息云”<sup>①</sup>。而除滨湖民众就近围垦小部分湖田外，大部分湖田皆为地方豪强士绅所侵占。百渎地带新涨湖田，豪强大族围圩后多以其姓氏为渎名，“百渎附近田亩整列，阡陌纵横，与崇海之沙圩相似……又渎之名，每冠以姓，如符渎、庞渎、毛渎等，均可谓围圩大姓之遗蜕”<sup>②</sup>。1934年夏，旱魃肆虐，宜兴西洑日渐干涸，滴水无存，宛如一片赤地，可供行走。地方士绅与政府部门此时不谋引水救旱，“公安局曾临时作为打靶场，练习实弹射击，宜兴绅士储南强已利用时机，于前日邀集各界茶话，即席建议就钓鱼台附近划界百亩，筑堤植树，种藕蒔荷，期成西湖名胜内之荷风曲院第二，日后逐年获利，概充地方教育及慈善事业经费”<sup>③</sup>。地方政府与士绅豪强早已对涸湖成田、水涸见陆“司空见惯”，熟练地利用这些湖田滩地以谋利。

东坝以下因利润颇大的湖田利益诉求而不欲建闸，东坝以上虽不时传出建闸呼声，但仅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群众抗争行动。这是因为东坝之坚固难以撼动，还是因为下游护卫东坝得当使上游无可趁之机，亦或是其他什么原因？

高淳县建设事务所所长马汝邵曾言“设高淳之民一旦铤而走险或被奸人利用，凡高淳沿湖之堤能泄水下游者，处处可决，勿谓铁铸之东坝定足恃也”<sup>④</sup>。可见高淳沿坝居民并非没有机会泄水，而是沿坝居民不想泄水，所谓高淳人民开坝建闸的呼声并非指代全体高淳人民。高淳境内地势西低东高，全县分为七区，“上三区虽多山，然有胥河横贯，下四区纯系水乡，大小共一百九十余圩，均濒临丹阳、固城、石臼三湖”<sup>⑤</sup>。西部下四区因地势较低，以水田居多，东坝筑后，江潮倒灌，出路受阻，境内丹阳、固城、石臼三湖本就蓄水过多，高淳又处于皖南最低处<sup>⑥</sup>，邻境皖之芜湖、宣城，地势皆较高淳为高，因而高淳坝西的水田洼地才是水患的重灾区。对于高淳沿坝居民而言，因东坝之阻，他们反少受水患威胁。1931年大水之时，经“皖之定埠至下坝，沿坝居民熙攘绝无惊惶之态，乃将坝身查勘一周。巩固如常，当即沿河步行至上坝中河，长十里，两岸田畴，地势颇高，早稻已熟，拯目四顾，喜禾无恨，两岸居民，方庆大有也，三时半抵上坝，繁荣更胜”<sup>⑦</sup>。此外，胥河作为皖南与江浙间的重要商道，虽有东坝、下坝之高筑，但其航程较短，且可避开南京大胜关厘金之重，来往商人多经此道。当皖省货船在行东坝时，无法直通上下河，需卸运换小船，利用绳索牵曳过坝，至下坝再次盘驳，“其间转卸费用，每担约需四五分”<sup>⑧</sup>。东坝、下坝不仅为沿坝居民提供了盘驳之利，来往商旅多在此停留，沿坝商店鳞次栉比，市场颇盛。直至厘金裁撤后，皖货东运才不再经过此道，改从长江至南京大胜关下达苏锡沪，东坝商业始日渐凋敝。“但往来于长十里之中河中之驳船，尚有一二百艘”<sup>⑨</sup>。东坝镇“有五千七百户，比较县城还热闹”<sup>⑩</sup>，是为高淳最繁盛地，土豪士绅亦大多居于此，尽享湖田和商业利益，根本不思开坝建闸。高淳下四区则因时遭水患，多为贫苦之民，势单力薄，毫无话语权。

上文已提及皖南地势高于高淳，加之“邻境当涂万顷湖地筑成大高圩，淳地更少此一大容水之

① 胡品元、萧开瀛：《调查：高淳溧阳水道及东坝调查报告书》，《太湖流域水利季刊》1928年第2卷第1期。

② 龚允文：《太湖流域农田水利略》第一编《水来源委》，第8页。

③ 《旱灾中之宜溧状况》，《时报》1934年8月28日第5版。

④ 马汝邵：《请浚复梓潼阁前废河至东坝北三里出下坝并改下坝为滚水坝以弥水患案》，《江苏建设》1933年第1期。

⑤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灾区工作组宁属区赈务报告》，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灾区工作组宁属区赈务专员办事处刊发，1932年，第41页。

⑥ 兹列最高水位之高度：“（以吴淞零点为单位）宁国府四九点一英尺，水阳三七点六英尺，大南漪湖四三点六英尺，太平府三七点六英尺，芜湖三九点九英尺，高淳三五点六英尺。”参考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三十七《胥溪东坝考》，南京水利实验处印行，1950年，第23页。

⑦ 《群情惶恐之高淳东坝溃放消息》，《大公报（无锡）》1931年9月11日第2版。

⑧ 胡焕庸、任美镔、李旭旦：《东坝考察记》，《方志月刊》1933年第6卷第12期。

⑨ 李鸿勋：《谈谈东坝的存废问题》，《江苏学生》1935年第5卷第5期。

⑩ 《东坝实情录》，《时报》1931年11月2日第6版。

区。”<sup>①</sup>相对而言,皖南受东坝的威胁要少一些。且高淳与皖省当涂、宣城接壤处还有一丹阳湖,面积广大,湖内滩地颇多,苏皖两省为勘界纠纷和湖滩开发问题争讼多年<sup>②</sup>。皖南与高淳往往以邻为壑,各自围圩筑埂。虽在20世纪20年代袁一清曾发起成立高淳、当涂、宣城“三县水利联合会”,三十年代汪国栋又号召设立“苏皖江南九县水利委员会”,也包含此三县。但这些水利机构组织松散,筹款艰难,对于改善几县之公共水利事业并未起到实质性作用。省界、湖滩纠纷与松散的水利组织关系使他们无法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因而在1931年大水时,坊间虽“盛传东坝到有安徽省难民四五千人,强欲开放之传说”<sup>③</sup>,但实际并“无所传之盛”<sup>④</sup>。且这些“皖省难民,虽称强欲拆坝,实际系藉故索赈而已”<sup>⑤</sup>。

当然,东坝下游形成的所谓利益共同体也并非牢不可破,有时仅仅是暂时的利益共同体。一旦触及当下切身利益,他们思想和行为的矛盾本质仍会显露出来。

1934年亢旱之下,下游溧宜武常人士一改往日保坝政策转而支持开坝。“宜兴绅士储南强,与溧阳人士发起救旱计划,极力主张开发东坝一部,改建新式水闸,旱则启之,潦则闭之,调节水利”<sup>⑥</sup>。武进县府议决“要求开放溧阳、高淳两县交界之东坝,救济下游旱荒,并改建水闸,以便随时启闭”<sup>⑦</sup>。对开坝建闸提议,溧宜私人倡之,武进公方和之。溧宜的开坝呼声仅在旱灾初期由民间发出,很快即因地方士绅的陈情利害而偃旗息鼓,政府官方层面未曾公开支持开坝。而武进县则是在此次开坝呼声中表现最为积极的官方,包括电请下游诸县一致主张开坝、赴省府请愿等。东坝上游之水不直接流经武进,其所受湖田利益自不如溧宜。亢旱之际,武进“属县南部灌溉,全恃太湖漕湖之水,而该两湖水位特低,港汊之水,因之枯竭,庠汲尤感困难”<sup>⑧</sup>。当下舍弃部分湖田利益,开坝以增加内河水位,借以庠救田禾,这是武进积极且迫切地主张开坝建闸的根本原因。宜兴储南强初期是开坝发起者之一,后却一度矢口否认曾倡议开坝,“据宜绅储南强对该县品报储松庵谈,东坝现状,水位不高,低窪之处,且见坝脚,故一旦开放,并不一定水能东来云云,足证倡议开放者,并非储君云”<sup>⑨</sup>。从前文其利用干涸的西沅赚取经费可窥其中内因一二。

一言以蔽之,“遮掩”在可怕的灾害风险认知体系和拮据的政府财政系统之下,各方潜在利益诉求的不同成为胥河之上难以开坝建闸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sup>⑩</sup>恩格斯说:“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sup>⑪</sup>一旦共同利益有变,各方群体即会因时因需做出行动调整,只为最大程度地维护当下自身的利益。

## 结 语

地理学家蒋君章认为“太湖水利问题之症结,不在水源之过大,而在尾闾之不畅,推其尾闾不畅之原因,有天然者,亦有人为者。”<sup>⑫</sup> 本文以为太湖水利问题之症结不仅在尾闾不畅,更在太湖上游淤塞不堪,

(下转第84页)

① 《叠被水灾》,《申报》1911年8月7日第1版。

② 徐建平:《从界限到界线:湖滩开发与省界成型——以丹阳湖为例》,《史林》2008年第3期。

③ 《昨日盛传高淳东坝又将开放》,《锡报》1931年9月22日第3版。

④ 《溧东坝开放说》,《时事新报(上海)》1931年9月23日第5版。

⑤ 《高淳东坝难民不坚持拆坝目的在多索赈款》,《锡报》1931年9月23日第3版。

⑥ 《宜溧两邑人士主张开东坝权救旱灾》,《新无锡》1934年7月11日第2版。

⑦ 《武进县防荒会昨议决开放东坝引水救旱》,《锡报》1934年7月11日第2版。

⑧ 《救旱固急防水更重开放东坝不致实现》,《锡报》1934年7月12日第2版。

⑨ 同上。

⑩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⑪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⑫ 蒋君章:《江苏史地概要》,江苏研究社,1936年,第126页。